

「飛機運狗」事件與戰時 中國大學反孔運動研究

汪伯軒*

摘 要

本文旨在針對 1942 年由昆明諸大學學生領導的反對孔祥熙，要求其受懲處與下台的學潮，是如何開始、串連擴散與質變。同時指出此次「反孔運動」因為戰時中國最重大的學生運動之一，有關戰時學潮的回憶錄多有論述此事，但相較下對該事件具學術價值的研究卻遠遠不足：從該事件導火線—孔祥熙飛機運狗報導，至昆明諸大學、浙江大學等校陸續串連爆發學生反孔罷課、遊行示威等運動，均存在相當多以訛傳訛，或者是先入為主、以偏蓋全的問題，實需重新加以審視。在本研究中，作者將以中國國民黨黨史館館藏第一手教育部檔案與反孔學潮相關電郵資料，配合前輩學者相關研究成果，將反孔運動分成：啟始—《大公報》誤報事件、大起—昆明大學倒孔風潮、蔓延—浙大等校繼起三部份分別檢視，除求能釐清有關該運動各種疑點之外，期能更深入瞭解各期「反孔運動」其各自領導者背景、反孔訴求、運動方式、教育部處理等等情況與變化。

關鍵詞：倒孔運動、反孔運動、飛機運狗事件、反孔學潮、戰時學潮、昆明反孔運動、浙大反孔運動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

一、前言

1941 年 12 月，是中國對日抗戰史上相當重要的分水嶺，隨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以及美國隨後的對日宣戰，代表中國即將走出孤立的對日戰爭困局，蔣中正（1887-1975）滿懷希望地認為中國苦撐多年的戰爭已開始露出勝利的曙光，但沒想一則直指當時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1880-1967）涉嫌「以飛機搭載洋狗」的負面新聞報導，卻在 1942 年初，開始在國民政府戰時對外聯繫，極富戰略重要性的雲南地區諸大學間，吹起一股要求孔祥熙下台負責的「反孔運動」浪潮，其中，極富盛名的西南聯大是主要領導力量。國民政府雖在第一時間消毒，查證該則報導為誤報，同時以軟硬兼施，封鎖消息等手法，力圖將此風潮壓下，但最初的努力是失敗的，「反孔運動」仍在國府控制地區各大學間串連，前後長達數月之久。

因該事件規模大，影響面廣，故在近來大陸興起對歷經戰時中國的耆老訪問、地方史料採集與戰時大專院校校史整理中，多少均會見到對此運動的追憶與材料發現，然而，這些材料多數有一嚴重問題：以先入為主對孔氏負面觀點來加以論述，並將之視為戰時國民政府專制腐敗的樣板範例，學者若不查這些材料內涵的問題，很容易隨之起舞而形成有問題的研究與評述。¹幸而近來大陸學界對此已開始有注意與反省，其中又以楊天石教授的〈「飛機搶運洋

¹ 單看臺灣學界研究受此害之例，如劉惠璇的博士論文〈抗戰時期大後方大學訓育問題之研究〉第四章第一節探討國府青年運動的缺失與大學學潮部份有關「倒孔運動」的使用材料即在未查閱相關政府檔案下偏信回憶錄材料，故在該事件起迄時間（如誤認昆明倒孔運動起於民30年冬天）、領導學生團體（如誤認浙大倒孔運動是中共地下組織領導）、經歷過程（如誤認浙大倒孔遊行是竺可楨領導，且言及事後政府當局要求竺可楨辭職，但竺以顧全大局拒絕，與事實不符）等等上均有明顯問題。見：劉惠璇，《抗戰時期大後方大學訓育問題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年），頁182-183。

狗」事件與打倒孔祥熙運動——一份不實報道引起的學潮〉²一文最能反映大陸學界這樣的變化。但楊氏的研究成果不過是重新認識 1942 年中國大學生進行「反孔運動」的開端，該運動仍包含許多問題值得我們再深究：「反孔運動」是否真如事後許多回憶錄與研究成果所說是一場「反政府」的學生運動？該學運領導份子真為「中共地下活動份子」？主管戰時中國教育事務的教育部長陳立夫（1900-2001）如何應付？該學潮爆發後為何呈現「雷聲大雨點小」的現象，最後落得草草結束的情況等等，都有相當多值得質疑與再討論的空間。

為求能更全面觀察此事件，本文擬以 1941 年 12 月的「飛機運狗」事件為探討發端，終於 1942 年 5 月中山大學彙報教育部發生反孔人事後，反孔事件出現質變而漸歇為止。³再則，為避免過去學術界對於「反孔運動」所論過於簡單或是「一概而論」的缺失，本文擬依照整體事件的發展順序為脈絡，注意每一階段的領導份子、運動手段、主要主張與政府應對處理方式四大要點，將該運動劃分成：序曲—《大公報》誤報事件、大起—昆明大學倒孔風潮、蔓延—浙大等校繼起此三部份來觀察「反孔運動」的發展與變化。在檔案運用方面，採用過去學界較少人使用的中國國民黨黨史館所藏教育部「反孔案卷」三大卷宗為核心資料，同時參考近來相關學術成果，期能對「反孔運動」有新的認識。

² 楊天石，〈「飛機搶運洋狗」事件與打倒孔祥熙運動——一份不實報道引起的學潮〉，《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II）》（香港：三聯出版社，2010年6月），頁 354-373。

³ 教育部編《教育部禁止各地學生遊行反孔案卷》三卷宗所收檔案亦止於民31年5月21日所發〈教育部致國立中山大學訓令〉。見：《教育部禁止學生遊行案卷》，第參冊，中國國民黨中央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以下簡稱「黨史館」），館藏號：特3/29.61。

二、序曲—《大公報》誤報事件

野火，若無可資持續燃燒的材料，是無法達到燎原的程度的，「反孔運動」之所以在日後發展成燎原大火，自有其深刻的背景。故在探討反孔運動前，我們必須先探討該運動爆發前孔祥熙家族在中國輿論（尤其是知識界）的評價概況，其次再深究「飛機運狗」事件詳細始末，力求能還該事件一個「本來面貌」。

孔祥熙，民國政治史上著名的長青樹，以其為首的孔家也被時人稱為民國四大家族之一。自 1928 年孔氏擔任南京國民政府工商部長始，歷任國民政府中央重要職務，更隨 1937 年中國對日本抗戰的爆發，孔氏再次獲得蔣中正的拔擢，於 1938 年升任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可謂達到一生官運的顛峰。雖然孔家顯赫於一時，但圍繞著孔家的批評與質疑不曾斷歇，即以孔祥熙本人而論，傅斯年（1896-1950）就於孔氏初任院長時提出猛烈批評，認為：「孔氏無權不攬，無事不自負，再積以時日，恐各部皆成備位之官，不只外交失其作用而已」。⁴此時蔣中正的立場仍是支持孔祥熙的，對其加以慰留，雖迫於輿論於 1939 年 12 月將孔祥熙降為行政院副院長，但仍繼續讓孔兼管中國財政。然隨戰爭蔓延與國民政府財政困難，孔祥熙運用通貨膨脹與外匯控管等方式應付軍需的浩繁，⁵亦造成民生的困苦與人心不滿，反襯孔家的家大財大，便造成戰時中國輿論界、知識界對孔家攻擊更加深化。在這些因素彼此激盪下，1941 年年底《大公報》一篇〈擁護修明政治案〉的社評為蓄積已久的反孔力量打開缺口，該篇報導也成為日後反孔運動領導人經常引用的孔氏貪腐誤國的「證據」，自然對於該篇文章內容與事件真實概況為何，有加以探究的必要。然楊天石已有詳實的的研究發

⁴ 轉引自楊天石，〈傅斯年攻倒孔祥熙〉，《百年潮》，（北京：1997年4月），頁75。

⁵ 可參見：蔡志新，〈孔祥熙和抗戰時期的通貨膨脹〉，《西南大學學報》，33:5（重慶，2007.9），頁157-163。

表，⁶故下僅作補充簡述。

1941年12月7日日本在挑起珍珠港事變後同時閃電進攻香港，國民政府眼見香港危急，為拯救滯港要員，遂決意增派班機搶運重要人士。12月9日晚間最後一梯次從渝飛港飛機三架派出，雖均於隔日（10日）平安返回，但因過程中一度為日本空襲打斷，故飛機尚未載滿乘客就不得不起飛折返，⁷原擬欲接回要人多未上機，導致許多至機場接着撲空，僅見孔祥熙的夫人宋靄齡（1889-1973）等人與大批箱籠、幾條洋狗從飛機上下來，由著男裝的孔令偉（又名孔令俊，1919-1994）接去。我們僅要想像聽聞香港戰事爆發，內心焦急的接機者最後等到卻是只從飛機下來孔氏一家與一箱箱箱籠，甚至還跳下幾隻洋狗的畫面，我們就不難理解現場民眾高漲的不滿與憤怒，這其中包括日後引起軒然大波的報紙——《大公報》編輯部人員。該員原是派至機場接由港撤回的《大公報》社長胡政之（1889-1949）的，但撲空後該員回去告知重慶《大公報》負責人王芸生（1901-1980）機場所見情景，「王芸生為之氣憤不已，又過了幾日，仍無胡政之的消息。恰巧這時國民黨在召開五屆九中全會，會議通過一個《增進行政效能，勵行法治制度，以修明政治案》，…王芸生便借題發揮，寫了一篇題為《擁護修明政治案》的社評，發表在12月22日的報上」。⁸該文重要內容是批判政府「官箴之不肅」、「官邪之不儆」：

譬如最近太平洋戰事爆發，逃難的飛機竟裝來了箱籠、老媽與洋狗，而多少應該內渡的人尚危懸海外。善於持盈保泰者，本應該斂鋒謙退，現竟這樣不識大體。又如某部長在重慶已有幾處住宅，最近竟用六十五萬元公款買了一所公館。

⁶ 楊天石，〈「飛機搶運洋狗」事件與打倒孔祥熙運動——一份不實報道引起的學潮〉，頁354--370。

⁷ 易社強著，饒佳榮譯，《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臺北縣：傳記文學出版社，2010），頁337。

⁸ 周雨，《大公報史》（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頁115。

現在九中全會既有修明政治之決議，我們輿論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溺職；新聞管理當局若不准我們發表，更是違背中央勵精圖治之旨。⁹

以上大致為「飛機運狗」事件由重慶《大公報》刊出的概況。

以媒體人角度而言，《大公報》「如實」報導的是民眾對貪官污吏的不滿，而且該社論所據以為文的「飛機運狗」事件也是按照「接機者」的直觀與合理推斷，個人以為無可厚非。然而以國民政府立場觀之，被指為「濫權」的孔祥熙位居行政院副院長的高位，此「子虛烏有」的「飛機運狗」事件經《大公報》報出不僅重創孔氏家族名譽，更加重創國民政府形象，影響抗戰事業，自然引起國民政府高度重視。報導刊出當日，蔣中正嚴令交通部徹查真相，同時向《大公報》探詢消息的來源，要求報社負責查明內容虛實。隔日，《大公報》覆函稱「事屬子虛，自認疏失」。¹⁰12月29日，國民政府交通部部長張嘉璈（1889-1979）將向中國航空公司調查結果，函至《大公報》，函稱：

本年12月22日貴報社評《擁護修明政治案》內文，涉及此次香港來渝逃難飛機裝載箱籠、老媽、洋狗，致多少應內渡之人尚危懸海外等語，當以此事為社會視聽所繫，經飭中國航空公司徹查具報，據稱……是日香港與九龍間交通斷絕，電話亦因轟炸不通，其未來公司接洽之乘客，無法通知。在起飛前，時已拂曉，因敵機來偵之故，不能再待，惟飛機尚有餘位，故本公司留港人員因此亦有搭機回渝，並將在站之中央銀行公物盡量裝載填充，隨即起飛，決無私人攜帶大量箱籠、老媽之事，亦無到站不能搭機之乘客。至美機師兩

⁹ 臺灣各圖書與檔案館存戰時重慶《大公報》原件多損毀嚴重無法辨讀，此處所引轉引自楊天石，〈「飛機搶運洋狗」事件與打倒孔祥熙運動——一份不實報道引起的學潮〉，頁355。

¹⁰ 〈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一年一月〉，《蔣中正總統文物》（民31年1月25日），國史館，館藏號：002-060100-160-025-005a。

人，因有空位，順便將洋狗四隻，計三十公斤，攜帶到渝，確有其事等情。查所稱各節，確屬實在情形，貴報社所述殊與事實不符，除美籍機師攜帶洋狗，殊屬不合，已由本部嚴予申徹外，相應函請查照，即予更正，以正觀聽。¹¹

該函雖為官方調查結果，然據楊天石多方佐證查考實為可信，¹²後王芸生亦接受交通部調查結果，先於12月30日報末以標題「交通部來函」形式全文報刊，再於隔年（1942年）1月22日《大公報》社評中坦承「飛機運狗」是「偶憑所聞」¹³而發，並無真憑實據。至此第一階段的「反孔運動」暫告一段落，但在戰時知識界對國民政府威信與孔祥熙氏評價不佳情形下，「反孔」之聲浪不但未如政府所預期停止，反而開始在各地大中學校校園內蔓延，最著名的指標為昆明四大學聯合倒孔行動，此亦可視為反孔運動第二期的發端。

三、大起—昆明大學倒孔風潮

對孔祥熙全方面的批評與激烈要求下台、嚴懲呼籲，大體以1942年1月5日西南聯大「民主牆」上出現「打倒孔祥熙」標語為一新的里程碑。西南聯大成為反孔運動的中心並不讓人意外，該校除集合中國最富盛名的三大學：北大、清華、南開於一體，被譽為「戰時中國學術自由與個人主義思想的堡壘」¹⁴外，雲南地區最

¹¹ 壽充一編，《孔祥熙其人其事》（北京市：中國文史社出版，新華發行，1987），頁363-364。

¹² 楊天石重要佐證包括：1942年1月12日宋慶齡致宋子文私函、1941年12月10日張嘉璈日記原件（楊天石附文〈關於「飛機搶運洋狗」事件的再考證〉所引張家璈日記處時間為民國31年12月10日當為誤記）與林史少敏〈永遠的大小姐孔令儀〉一文。詳可見：楊天石，〈關於「飛機搶運洋狗」事件的再考證〉，頁368-370。

¹³ 〈青年與政治〉，《大公報》，1942年1月22日社評。

¹⁴ 易社強著，饒佳榮譯，《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第十七章結語，頁425-430。

高首長龍雲（1884-1962）與重慶中央微妙的抗衡作用，亦提供聯大較寬鬆的發言空間，誠如易社強對於西南聯大的研究中所稱：「在批判重慶政府方面，沒有人比雲南省主席更堅決擁護言論自由」。¹⁵在聯大眾多教授中，雖有不少對政治冷漠、始終保持距離的學者，但亦不乏長期關注政治者存在，在西南聯大中以政治系教授張奚若（1889-1973）、羅隆基（1896-1965），歷史系教授吳晗（1909-1969）等為代表，他們對反孔運動的發生均起重要影響。戰時張、羅二人被聘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經常將會議中對政府質詢的消息帶回昆明，是聯大中對政府消息與問題的傳播者；明史專家吳晗則以批判政府著稱。12月24日，昆明《朝報》轉載了《大公報》〈擁護修明政治案〉一文，並將標題改為〈從修明政治說到飛機運狗〉，「運狗」一點更被突出，刺激吳晗在大一《中國通史》課堂上猛烈批判孔祥熙，將孔祥熙與南宋賈似道（1213-1275）、明朝的馬士英（約1591-1648）並稱，諷其為「飛狗院長」。¹⁶吳晗一席話誠如李曦沐所稱深具「放火」之作用，挑動學生反孔的情緒，但掀起大浪者並不僅於此。在1942年元月初，又從重慶傳回郭泰祺（1889-1952）等國府要人在港遇害的消息，此後昆明地區各種關於孔家「害死黨國要人」的謠言廣泛流傳，終使昆明學生蓄積已久的憤怒情緒一口氣爆發。¹⁷

關於這次反孔運動經過，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在第一時間發給教育部相當完整的情報，原件名為〈中央調查統計局致教育部函〉¹⁸現藏於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下簡稱黨史館）中，是目前所知教育部收到的昆明反孔報告最早最完整的一份，可

¹⁵ 易社強著，饒佳榮譯，《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頁101。

¹⁶ 李曦沐，〈追念吳晗先生〉，《百年潮》，（北京：2009年9月），頁53。

¹⁷ 聯大職員由渝傳回郭泰祺在港遇害消息因此引發學生遊行事，見：中國國民黨黨史館館藏，〈龍雲致蔣委員長密電〉，《教育部禁止學生遊行案卷》，第參冊（檔案：特殊檔案。館藏號：特3/29.44）。

¹⁸ 〈中央調查統計局致教育部函〉，《教育部禁止各地學生遊行反孔案卷》，第壹冊（民31年1月15日發），黨史館，館藏號：特3/29.1。

作為政府掌握整體運動概況與處理的極佳文本，分析如下：

（一）不確定的「奸黨份子」身份

這份文件開宗指明：有「奸黨份子」利用西南聯大學生憤慨於孔祥熙「飛機運狗」之報導而趁機活動，而青年團同志「曾向團建議如何控制將來可能之事件」，但因「事出意外」預防不及而使反孔運動開始擴大，似乎調查人員先入為主認定整件事件是「奸偽份子」挑撥學生對政府不滿而爆發此反孔運動。但有趣的是，觀察整份報告始終未指明何人為「奸黨份子」或是背後是怎樣勢力在領導。同時報告中也不斷宣告這些「奸黨份子」並非反政府的不良份子，如：七日載明其組織的聯大政治系討孔聲援會申明「討孔動機，純出誠正」，同日組成之學生自治會討孔運動委員會也組織有「組織股」，其中一項任務是領導宿舍同學監視搗亂反孔運動之不良份子；九日所開全市學生代表大會亦被認定發動人員多是中立學生。個人認為這些內部矛盾直指國民政府內部認定的問題：自身基層黨員或團員不會領導反政府官員學潮，或是有此舉動的就絕非國民黨黨員或青年團團員。

但是事實隨調查的深入，「奸偽份子」的身份頗讓國民政府高層震驚：不少聯大領導者正是三民主義青年團（下簡稱青年團）的團員。此處需說明，本文並非否認有潛伏的共產黨員參與其中，但在聯大最初的反孔運動領導人確系屬於青年團成員。在易社強與楊天石的研究中均指出聯大大一新生鄒文靖、程陶、¹⁹鍾正等人為發起者，鄒文靖甚至為最早「討孔宣言」起草者，而他們另一個身份即是青年團團員。²⁰早於聯大新生宿舍進行反孔遊行前，鄒文靖、鍾正曾找過身兼聯大教育系教授與青年團直屬分團部書記長的陳雪

¹⁹ 《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中將「程陶」誤譯為「程濤」。見：易社強著，饒佳榮譯，《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頁338。

²⁰ 楊天石，〈「飛機搶運洋狗」事件與打倒孔祥熙運動——一份不實報道引起的學潮〉，頁356；易社強著，饒佳榮譯，《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頁338。

屏（1901-1999），要求以聯大三青團的名義發起反孔運動，陳拒絕後，鄒等開始起草《討孔宣言》，並得二十六人連署支持²¹，可視為聯大討孔運動的發端。在一月六日昆明街上的反孔大遊行中，聯大內部潛伏的共產黨員大一新生齊亮、王世堂、高志遠以及原中共鄂西特委副書記馬千禾（馬識途）等都有參加遊行，²²但是遊行回來後中共黨員見該活動都是由青年團團員在領導，故紛紛退出了。²³至此，領導昆明反孔運動是否真為「奸黨份子」答案已招然若揭。

至於國民政府高層是何時才意識到昆明的反孔運動其實是一場「茶壺內的風暴」呢？依據資料可以肯定的推測，在此時期國民黨高層其實早已發覺，但始終加以「直覺上」的否認，企圖追捕不存在的「奸偽份子」。這我們可從教育部所收相關各部門公文電報往返看出些端倪：最早會報中央昆明發生反孔運動者是國民黨雲南省黨部書記長趙澍，其在 6 日晚彙報組織部部長朱家驊（1893-1963）中稱該事件「顯係有組織策動」；²⁴8 日教育部部長陳立夫在電覆朱家驊來電時亦稱：「此事顯係有人策動」，囑朱家驊聯絡相關黨政軍機構小心應付；²⁵11 日蔣中正代電陳立夫的指示為：「電聯大各校長蔣夢麟等追究此事之內容及其煽動為首之人員，尤

²¹ 楊天石，〈「飛機搶運洋狗」事件與打倒孔祥熙運動——一份不實報道引起的學潮〉，頁 356。

²² 楊天石，〈「飛機搶運洋狗」事件與打倒孔祥熙運動——一份不實報道引起的學潮〉，頁 356

²³ 據熊德基的回憶：「遊行回來，同學們又討論成立組織繼續搞下去，但跳上台最賣勁的是幾個三青團員，一些進步同學看到這情況，便紛紛退出，這個『倒孔運動』也就偃旗息鼓了。」見：熊德基，〈我在聯大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的回憶〉，《雲南文史資料》，第34輯（昆明市：雲南人民出版社，1985），頁376。

²⁴ 中研院近史所館藏，〈致中央黨部組織部朱部長〉，《朱家驊檔案》。檔號：301-01-06-050。轉引自楊天石，〈「飛機搶運洋狗」事件與打倒孔祥熙運動——一份不實報道引起的學潮〉，頁363。

²⁵ 〈陳立夫致朱家驊覆電〉，《教育部禁止學生遊行案卷》，第參冊（民31年1月8日），黨史館，館藏號：特3/29.53。

其是教職員參加或策動者應切實詳報」。²⁶據上我們可知昆明反孔事件剛發生時就像前引調查局報告一樣，國民黨高層一致依經驗認為是「奸黨」在進行「有組織」的活動，而「奸偽份子」極有可能是有反政府背景的教授或異黨學生，但實際為何人仍不確定。依據楊天石的研究，蔣中正最早懷疑的是國家社會黨要人張君勱（1887-1969），後又懷疑是張在昆明「政治友人」，同具國社黨背景的羅隆基，兩人據地方黨部與組織部調查也確有參與反孔運動。²⁷但蔣中正在派遣康澤（1904-1967）到昆明調查後，證明學潮與國社黨無關。至於共產黨部份，為貫徹「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也沒有領導這次運動。²⁸

至於教育部部長陳立夫的看法，在昆明反孔運動爆發後其雖於第一時間判斷「顯係有人策動」，但身份尚無法判斷，故其派教育部次長顧毓琇（1902-2002）至聯大調查，但除青年團團員外並無「異黨」領導新證據。其實有關青年團有涉入反孔事件的情報早在趙澍的報告中稍有提及，陳立夫等黨部政府高層不可能沒有留意，然在1月23日陳立夫對蔣中正的彙報該風潮首滋事份子時仍僅言「查明再報」，²⁹展現相當的謹慎。之所以如此，個人推敲陳立夫久歷官場，自知此事涉敏感，畢竟青年團是蔣直接領導，在沒有確切證據前直接匯報只會招惹很大的麻煩；再則陳立夫可能認為「奸黨份子」應更有隱藏的煽動者但苦無證據，至於開始有確證

²⁶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致教育部陳部長代電〉，《教育部禁止學生遊行案卷》，第參冊（民31年1月15日發），黨史館，館藏號：特3/29.44。

²⁷ 以昆明第一線處理學潮的雲南黨部書記長趙澍第二次致朱家驊電報（1月7日電）中，直接羅列正因張奚若、羅隆基等人自參政會歸來後即大事宣揚質問孔祥熙要人消息，學生已「多表同情」；後再經地方朝報轉載大公報之孔祥熙「飛機運狗不運要人」消息，遂使反孔風潮形成。見：〈朱家驊至陳立夫函〉所附抄電，《教育部禁止學生遊行案卷》，第參冊（民31年1月10日），黨史館，館藏號：特3/29.34。

²⁸ 楊天石，〈「飛機搶運洋狗」事件與打倒孔祥熙運動——一份不實報道引起的學潮〉，頁365。

²⁹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致教育部陳部長代電〉，《教育部禁止學生遊行案卷》，第參冊，（民31年1月15日發），黨史館，館藏號：特3/29.44。

「奸偽份子」從中活動要到下一期反孔運動擴散後，此亦於後再述。

（二）對昆明反孔運動訴求掌握與反制

黨政調查單位最想確認的，除上述主導者身份背景清查外，就屬確認昆明學生反孔主要目的與主張為何。在調查統計局報告中有清楚載明由一月五日至九日學生訴求的主張變化：從西南聯大最早刊登的《喊》³⁰報內容，到中統整理的「吶喊」、「呼聲」、「正義」、「二十三」、「響應」等壁報大意、討孔運動後援會提議案、以及對外發佈的「討孔通電」內容看來，大體此時期共通主張有：（一）支持政府「修明政治」，要求孔祥熙下台並沒收其財產；（二）控訴孔祥熙的經濟政策與操縱外匯手段，認為其必須對物價高漲負責；（三）革新國民黨，剷除黨內敗類。其實這些訴求內容的蒐集正反映了與上述領導者的調查展現相同的矛盾：雖一口咬定是「奸黨份子」煽動結果，卻更像基層黨、團員要求「革新」國民黨治，與一般中立學生要求「修明」政府吏治，亦是此緣故，支持活動的學生教師才會如此之眾，這也可從七日聯大發動的募款活動竟在短短不到一日已獲國幣千餘元（給教育部的情報中列明至八日晨已獲國幣千餘元）得到旁證。可惜的是當時政府見不到此，朱家驊給雲南省黨部書記長趙澍的電報僅云：「大敵當前，勝利第一。且南洋風雲日亟，滇省正在出擊之時，不容再有任何紛爭。」³¹展現黨政中央高層優先注意的是即將開始的南方戰局與地方秩序，故無法正視學生指陳的黨政貪腐缺失，僅展現消極防堵而非有建設性的改革。

³⁰ 此處稍加訂正楊天石在〈「飛機搶運洋狗」事件與打倒孔祥熙運動——一份不實報道引起的學潮〉一文中論述西南聯大新校舍在1月5日刊出壁報《吶喊》是錯誤的，該日刊出的實為《喊》報而非《吶喊》，《吶喊》是2日後呼應《喊》報再刊出的。見：為〈在遵義發現之昆明聯大傳單〉，《教育部禁止學生遊行案卷》，第參冊（原件無時間），黨史館，館藏號：特3/29.38。

³¹ 〈覆趙澍〉，《朱家驊檔案》，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檔藏號：301-01-06-050。

無論領導者身份為何，訴求是否正當，誠如已論，政府首先關注的都是秩序的恢復，而身為主管教育事務的教育部長陳立夫，當然責無旁貸需負起處理疏導與壓制的責任。陳立夫大約在反孔運動爆發的第一時間就從中央調查統計局局長朱家驊處得知該事件詳細情報，陳立夫處理情形可參見附表一。大致而言陳氏第一時間的處理是要求聯大等校常委、雲大校長負責澄清事實與制止學生遊行罷課，並在1月8日、9日，迅速致電轄下近二十所大專院校校長，大至內容均為：「昆明聯大學生發動反孔副院長運動，並聯合雲大等校學生遊行開會等情事，除已電令聯大雲大等校迅即制止外，希密加防範為要。」³²可見教育部第一步是刻意模糊昆明反孔運動爆發原因以免再生波折，另則要求各校長全權負責與先期「密加防範」可能的反孔浪潮；其次派教育部次長顧毓琇前往昆明協助調查與處理；第三步調查為首者背景，包括11日後待昆明倒孔情勢緩和，陳立夫依蔣中正命令，陸續要求西南聯大清查「天下」壁報出刊學生背景，調查「為首煽動人員」與聯大教職員是否參加等盡快「詳報到部」；³³另一方面陳立夫也隨時彙報與請示反孔學潮情事給蔣中正。由上可知陳立夫處理學潮的老練與沉穩：一方面力謀控制與預防昆明學潮可能帶來的傷害與影響，再則充分扮演政府、黨與學校三方面的協調者與溝通者，盡量以學校校長處理自身校務，同時以黨、政、軍等情報系統密切監控之，既非一味強硬介入，亦非消極放任之，此與不少時人回憶錄中描述的陳立夫強硬干涉或鎮壓學潮之「形象」大相逕庭，不可不注意。

至於身居第一線的地方黨部長官與聯大校方，對於已起而鬧事的昆明諸大中學生，雲南黨部書記長趙澍的處理是：「職得息後即一面與梅校委、查訓導長及警務處等接洽，一面派人調查真像，沿

³² 見：〈教育部致樂山武漢大學王校長等電〉、〈教育部致四川大學等電〉、〈教育部致復旦大學等代電〉，均收《教育部禁止學生遊行案卷》，第參冊（民31年1月8日、9日），黨史館，館藏號：特3/29.55。

³³ 〈西南聯大致教育部復電〉，《教育部禁止學生遊行案卷》，第參冊（民31年1月20日），黨史館，館藏號：特3/29.55。

街標語均由警務處飭警撕去或塗去，夜間（6日晚）赴飭各報館不許登載是項消息（今日均未登），同時交由黨部所屬之雲南通訊社發出吳稚暉（1865-1953）先生等仍安居重慶之消息一則。」³⁴聯大常委蔣夢麟（1886-1964）、梅貽琦（1889-1962）等人則是先於6日學生遊行爆發時力圖制止，無效後蔣氏走在隊伍最前面（但保持一段距離），以防軍警與學生可能起的衝突；³⁵蔣夢麟同時報告陳立夫事件簡單經過，並強調學生「經地方軍警勸阻已回校照常上課」；³⁶9日，蔣氏再「召集昆明市各大學全體學生訓話，懇切告誡切勿輕信謠言，擅作無謂舉動，如再故違，定予嚴懲不貸！」³⁷大體均以較柔性的澄清事實、口頭警告，與封鎖消息為主要手段。

由於此次昆明學生反孔運動領導人多是青年團團員，在黨政要人已陸續回到重慶消息得到證實，外加1月9日康澤飛到昆明，告訴青年團團員蔣大發雷霆，並揚言不再向聯大青年團提供教室和油印機，³⁸在校方和黨政高層警告之下，昆明反孔浪潮平息的非常快速。1月9日，聯大蔣夢麟已回報陳立夫「目下全校安謐如常」。10日，討孔運動委員會貼出布告，宣布解散，同時學生還派出代表向雲南社記者致歉，⁴⁰昆明中大學生倒孔運動大體平息。

³⁴ 〈朱家驊致陳立夫函〉所附抄電，《教育部禁止學生遊行案卷》，第參冊（民31年1月10日），黨史館，館藏號：特3/29.34。

³⁵ 易社強著，饒佳榮譯，《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頁339。

³⁶ 〈蔣夢麟等致陳教育部長電〉，《教育部禁止學生遊行案卷》，第參冊（民31年1月10日），黨史館，館藏號：特3/29.45。

³⁷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致教育部陳部長代電〉，《教育部禁止學生遊行案卷》，第參冊（民31年1月15日發），黨史館，館藏號：特3/29.44。

³⁸ 易社強著，饒佳榮譯，《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頁339。

³⁹ 〈昆明西南聯大致教育部電〉，《教育部禁止各地學生遊行反孔案卷》，第壹冊（民31年1月9日），黨史館，館藏號：特3/29.1。

⁴⁰ 〈致駱公部長〉，《朱家驊檔案》（民31年1月12日），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檔藏號：301-01-06-050。

四、蔓延—浙大等校進行的反孔運動

過去許多回憶錄中對戰時學潮的論述常犯一嚴重錯誤，即似乎所有學生運動均為共產黨所領導，並且若非共產黨領導則甚難成功，如熊德基在論述為何昆明反孔運動會迅速「偃旗息鼓」即認為「缺乏共產黨領導」，⁴¹其實這都犯了先入為主與意識型態為祟的毛病。上面文章已證實聯大青年團團員也有能力迅速整合學校各社團與學生各團體，並領導反孔開會與遊行，同時進行跨校際聯繫，號召籌募款項也相當順利，這些都可說明青年團在戰時學校有一定影響力，故領導學潮並非共黨份子不可。至於最終反孔風潮仍藉由種種方式突破國民政府封鎖並成功向他校輸出，各校學生反孔情形如何？各校領導者又是何背景？受昆明反孔風潮怎樣程度的影響？主張與訴求有何轉變？政府因應情況又如何？這些都為進一步觀察反孔運動承續與變化的重點。為能較扼要且深入探討這些問題，本文下面將挑選不同擴散情況加以簡要分類論述之。

（一）反孔運動再次走上街頭之例：浙江大學反孔風潮

在蘆溝橋事件爆發後不久，浙大為避戰禍輾轉西遷，1940年初最終落腳於貴州遵義，此為戰時浙大校本部所在地。為疏散過多學生，浙大另有永興校區為一年級居所，湄潭校區為農學院、理學院及師院理科所在地，此即為浙大戰時主要三大校地，而與本文最相關有爆發反孔情事者以遵義、湄潭兩校區為主，其中又以走上街頭大肆活動的遵義校區反孔最受矚目，然湄潭校區反孔也有相當重要的變化發生，分述於下：

1. 遵義校區：

⁴¹ 熊德基，〈我在聯大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的回憶〉，《雲南文史資料》，第34輯，頁376。

據日後教育部派遣督學與專員至浙大深入調查的報告⁴²來看，浙大遵義校區爆發反孔運動是源於 1 月 12 日一位王姓的浙大學生接獲一封由西南聯大寄出，原擬轉寄至湄潭的《反孔傳單》，⁴³該文件亦完整收錄於教育部反孔檔案中，可作為遵義反孔消息傳播與變化的文本。內容有以下特色：

(1)誇大「飛機運狗」的情節與「香港要人」的損失：

該文件一開頭直接羅列「香港要人」損失名單：「吳稚老全家在香港殉難」、「外交家顏惠慶，革命勇將胡宗南被殺被俘」以聳人視聽，同時更誇大描述在重慶機場狗下飛機的情景：「在渝機場停下來，只聽見狗叫『狗要喝牛奶了』的孔太太，皮箱 54 只，狗，老媽子」。察此份宣傳單中虛構《大公報》中未報的「狗喝牛奶」情節，當是為加強戰時絕大多數不得溫飽的學生、教職員、一般民眾最深層的憤慨，可謂篇幅雖短但極具聳動的力量。

1)強調反孔運動是「黨的同志」在領導，呼籲校中青年團起而領導：

該文件藉摘要聯大「喊」報（第二條）澄清反孔之黨「是領導抗戰到底的黨，有英明的領袖，革命的三民主義，更有廣大的黨員，但不能否認的，黨內還有不少腐化份子，腐蝕了黨，這種敗類，必須加以肅清，這是全體國民黨黨員的任務」。此點澄清是企圖撇清為「奸偽」煽動之嫌疑，並藉此增強浙大校中青年團領導反孔的信心。

2)高舉「五四精神」：

該文件宣傳口號是：「燃起五四火把，剷除貪官污吏」，同時宣稱：「今日環境下，四川各大學，浙大，武大，力量太孤單，只有我們聯大三千學生可負此責任，而向全國聲援通電」，希望透過

⁴² 〈教育部長陳立夫上委員長簽呈〉附鍾道贊報告，《教育部禁止學生遊行案卷》，第參冊（民31年2月1日），黨史館，館藏號：特3/29.35。□表原件內容毀損無法辨讀，下同。

⁴³ 〈在遵義發現之昆明聯大傳單〉，《教育部禁止學生遊行案卷》，第參冊（原件無時間），黨史館，館藏號：特3/29.38。

在「五四精神」旗幟下能夠成功串連學生反孔運動。

王生收信後將該宣傳品在學生間傳閱，經過三天的醞釀，浙大學生正式於 1 月 15 日晚上召開學生自治會討論反孔工作步驟及開會地址（定於浙大），決定於隔日（16 日）早上 7 時進行開會，並選出陳天保、陳海鳴、王天心等人任主席，出席者中還包括青年團幹部劉紉蘭、俞宗稷（劉係幹事，俞係書記長）等人。會中張由椿、王蕙、陳天保、陳海鳴、鄒金聲、何友源、陳立、王天心、樓韻午、張思亮等人曾發表演說，大致陳述孔對馬寅初（1882-1982）事件及孔家之奢華與前運港事端之要人慘死洋狗反全等事。會畢，動員為數約四百人進行遊行，遊行中高呼口號與聯大時期並無大差異，仍是：「打倒孔……。剷除孔賊。擁護政府澄清吏治。擁護蔣委員長。」但負責調查的鍾道贊則指出該場遊行其他標語中曾發現共黨工作四十大綱要，⁴⁴展現訴求日雜。遊行過程中，浙大學生一邊舉行公開演講，一邊大量散發名為〈除孔宣言〉的傳單，並將聯大昆明來函張貼於校內。當浙大學生大張旗鼓地進行遊行時，遵義當地軍警因與浙大校長竺可楨（1890-1974）已有默契，採取消極防制態度，包括洗除標語、收沒傳單，遣散聚眾，最後亦未越入校門。遊行畢，浙大遵義學生假公共體育場開倒孔大會，議決三點：一、組織除孔委員會；二、擴大宣傳與各方聯絡；三、電呈蔣委員長。該倒孔大會與會者約三百餘人。至上午 11 時會畢返校，午後上課如初。此即為浙大遵義校區爆發反孔遊行的大致過程。⁴⁵

上述浙大〈除孔宣言〉內容憲兵司令部蒐錄後電知教育部，其內容基於王生收到的聯大宣傳品再加以擴充⁴⁶，要點有：

⁴⁴ 〈教育部長陳立夫上委員長簽呈〉附鍾道贊報告，《教育部禁止學生遊行案卷》，第參冊（民31年2月1日），黨史館，館藏號：特3/29.35。

⁴⁵ 整理自鍾道贊等的調查報告。見：〈教育部長陳立夫上委員長簽呈〉附鍾道贊報告，《教育部禁止學生遊行案卷》，第參冊（民31年2月1日），黨史館，館藏號：特3/29.35。

⁴⁶ 〈憲兵司令部致陳部長電〉，《教育部禁止各地學生遊行反孔案卷》，第壹冊（民31年2

- 1) 反對孔家特權，反對孔祥熙掌握國家經濟命脈。
- 2) 控訴孔家「飛機運狗」害死要人：浙大反孔宣傳除以訛傳訛外更加渲染「受害名單」，此時因孔家「飛機運狗」而受害者已成九人，包括：「郭泰祺、王寵惠、胡宗南、顏惠慶等被俘了，吳稚暉、鄒韜奮全家自殺了，范長江、沈雁冰、金仲華等犧牲的生命」。
- 3) 要求嚴懲孔家，首次公開提出「誅殺孔氏，抄沒孔家」。

合論上述官方蒐集自浙大遵義學生反孔以來的訴求與活動情形，可得較之昆明反孔重要轉變有：

(2) 參與份子日趨複雜：

在教育部督學鍾道贊的報告裡首次指明反孔訴求「發現共黨工作四十大綱要」，這使國民政府自昆明反孔運動爆發以來最大的隱憂得到證實，教育部亦加強清查領導遵義反孔學生背景，最後列出「幕後主動而有共黨嫌疑者」四人名單如下：

王蕙（女，活動人物）、陳天保（男，主持嫌疑）、陳海鳴、王天心⁴⁷

這是教育部首次送出共黨嫌疑名單，展現反孔運動可能已有共黨份子在領導。然而真正引起國民黨中央高度關切的，反是青年團再次涉入反孔領導活動。蔣中正在 2 月 16 日電教育部的電文中要求嚴加注意「西南聯大反孔運動主動份子」中有八名是「本黨黨員或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⁴⁸此為蔣首此在倒孔運動中要求陳立夫留心地方青年團團員是否失去控制的問題。對於青年團地方成員、幹部的不信任感早在蔣個人的日記中展現，他在稍早 1 月 24 日的日記中紀錄到：「本週最使人憂憤者仍為西南聯大所鼓動之學潮，我青

月），黨史館，館藏號：特3/29.18。

⁴⁷ 〈浙大學潮事件可疑人員與被懲處人員名單〉，《教育部禁止學生遊行案卷》，第參冊（原件僅標註民31年），黨史館，館藏號：特3/29.36。

⁴⁸ 〈蔣委員長致陳教育部長代電〉，《教育部禁止各地學生遊行反孔案卷》，第壹冊（民31年2月16日），黨史館，館藏號：特3/29.20。

年團幹部糊塗散漫，一任反動派從中利用與主使而昏昧不悟，事事幾乎非余親自設計與擬稿不可，實足為本黨前途憂也」，⁴⁹隔日（25日）蔣又批評到：「青年團幹部行動幼稚，識見愚昧，是皆余不能善教之故也，憤激悲傷何益耶」。⁵⁰同時他也疑心張治中（1890-1969）是否縱容青年團學生倒孔，同日（25日）蔣一面緊急通電各省政府主席暨省黨部主任委員書記長，嚴令切實制止學生之越軌行動，一面藉批閱文件，痛斥張治中之「投機」。張治中在自身的回憶錄中記載著蔣對其不假詞色地大發脾氣：「這時候，正好昆明發生『倒孔運動』，有人報告蔣，說這是青年團發動的。蔣非常氣憤，只在我的意見上打了許多圈、點、槓和問號，不加批覆，但另寫一張手條，大發脾氣，指責青年團幹的是反革命的工作」。⁵¹

到底是否是張治中在幕後指導或默許青年團員進行「反孔運動」？此論點雖曾由張治中的機要秘書余湛邦曾經為文證實，⁵²但個人持較保留意見，理由有二，一則因張氏本人未承認此事，再則以政府調查檔案看來多屬青年團團員個人行為，趁反孔情緒之高漲而引領之，非透過黨團力量去動員群眾，且在蔣中正不支持下，張治中不可能有多少利用青年團組織活動反孔的空間，尤其是該活動被蔣直斥後，除非有進一步證據，否則宜先作保守的推測應為青年團個別團員趁勢領導下之產物，但是反應出蔣對於基層團員缺乏溝通與控制之一斑。至於陳立夫對青年團再次涉入反孔事件，其進一步疑心是否青年團遭「奸黨混入」，故要求顧毓秀：「特電中央組織部三民主義青年團，查究是否有奸黨混入，並送顧次長（顧毓

⁴⁹ 轉引自楊天石，〈「飛機搶運洋狗」事件與打倒孔祥熙運動——一份不實報導引起的學潮〉，頁366。

⁵⁰ 〈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一年一月〉，《蔣中正總統文物》（民31年1月25日），國史館，館藏號：002-060100-160-025-005a。

⁵¹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上冊（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頁356。

⁵² 余湛邦，〈倒孔運動中的張治中〉，《百年潮》，（北京：1998年3月），頁68-69。

秀)口討」。⁵³

(3)政府處置轉為嚴格：

為亡羊補牢，此次黨團與浙大校方對於涉入的學生，懲處既快速且果決：

浙大十八日佈告學生鄒金聲、俞宗稷、張由椿、劉紉蘭四人因記大過；雲中鄒俞二生開除學籍，因應前過也。自首者有王天心、陳海鳴、蘇隱蘆、王鴻禮、蕭學愷、王與言諸人（此數人自首之外並請求減輕鄒俞二人處分，許以自新之路，不然亦願同受相當處罰）校中當無處置待部決度。⁵⁴

教育部最後同意原浙大校方的決議，此殺雞儆猴的手段使浙大遵義校區「自十七日後學校秩序一如平常」。⁵⁵但有鑑反孔運動已呈擴散之勢，單是制止遵義浙大學生的反孔是不夠的，軍警立刻採取更嚴密的消息封鎖與要求校方傳達嚴禁各校學生集會的指示。要者包括：（一）絕對禁止各校學生集會；（二）臨時斷絕浙大學生一切通訊；（三）嚴密檢查郵電；（四）澈究此次妄動主謀，⁵⁶顯已補過過去忽略信件審查的漏洞。但蔣中正顯然對這樣的處置仍嫌不夠。1月22日蔣要求教育部轉飭各級學校以下訓令：

我國自對暴日與軸心國宣戰以來責任愈加重大，事業益為艱鉅，凡我全國國民均應刻苦沈著嚴守紀律，各在本位加倍振奮，克盡職責，發揮整齊嚴肅之戰時精神，決不可再有任何粉飾虛矯之無謂鋪張，及影響後方社會秩序之行動，免使敵

⁵³ 中國國民黨黨史館館藏，〈蔣委員長致陳教育部長代電〉，《教育部禁止各地學生遊行反孔案卷》，第壹冊（檔案：特殊檔案。館藏號：特3/29.20）。

⁵⁴ 〈教育部長陳立夫上委員長簽呈〉附鍾道贊報告，《教育部禁止學生遊行案卷》，第參冊（民31年2月1日），黨史館，館藏號：特3/29.35。

⁵⁵ 〈教育部長陳立夫上委員長簽呈〉附鍾道贊報告，《教育部禁止學生遊行案卷》，第參冊（民31年2月1日），黨史館，館藏號：特3/29.35。

⁵⁶ 〈軍政部致教育部代電〉，《教育部禁止各地學生遊行反孔案卷》，第壹冊（民31年2月7日），黨史館，館藏號：特3/29.17。

諜漢奸混入為祟。嗣後各省市及其所屬地方，無論任何團體及學校學生與一般民眾，概不得假借任何名義集眾遊行，應由當地各級軍政機關負責取締，嚴切禁止，如有故違禁令者，不問何人主動，即以擾亂治安論罪。⁵⁷

該訓令以國家最高領袖表明任何集會遊行都是「擾亂社會秩序行為」，徒給「敵諜漢奸」可趁之機，並明確告知學生，「無論何名義」進行遊行與抗議都要「以擾亂治安論罪」，以嚇阻學生類似行動或可能的進一步滋事。在政府「文攻武嚇」之下，教育部派出督學與各地大專院校校長紛紛回報「平靜如常」，似乎事件已暫時獲得控制。

(4)教育部等對教職員反孔態度的持續關注：

如同對於聯大教職員反孔態度與參與情形的調查，此次浙大反孔遊行教職員參與狀況一樣是政府注意的焦點。教育部、軍政部與憲兵司令部所做調查均置重心與此部份，身為浙大校長竺可楨的動態尤其備受各界關注。有趣的是，官方對竺可楨在此事件中扮演角色與許多時人回憶並不相符。

許多浙大校友回憶錄中屢屢提到竺可楨面對本校學生發起反孔運動是「同反動當局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如李華超等回憶：「為了保護學生不受反動派的迫害，他總是毅然和學生站在一起。如1942年1月，學生上街遊行，強烈反對孔祥熙，竺校長就毅然走在學生遊行隊伍的前面，保護學生遊行」，⁵⁸馬國均在〈懷念故校長竺可楨先生〉亦有類此竺氏保護學生的紀錄，⁵⁹導致劉惠璇在其博士論文《抗戰時期大後方大學訓育問題之研究》中作這樣結論：

⁵⁷ 〈行政院致教育部訓令〉，《教育部禁止各地學生遊行反孔案卷》，第壹冊（民31年1月22日），黨史館，館藏號：特3/29.9。

⁵⁸ 李華超，洪星，〈浙江大學在湄潭〉，《抗戰時期內遷西南的高等院校》（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1988），頁127-128。

⁵⁹ 馬國均，懷念故校長竺可楨先生〉，《國立浙江大學》上冊（臺北：國立浙江大學校友會印行，1985年4月），頁181-182。

「校長竺可楨領導遊行隊伍，保護學生，事後當局要竺引咎辭職，但竺已顧全大局拒絕」。⁶⁰

其實上述記載均與官方記錄有相當大的出入。值得注意的幾筆資料有：

1)〈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致陳教育部長電〉：⁶¹

證明竺可楨在第一時間向陳立夫會報浙大反孔運動爆發同時表示願意引咎辭職，反是陳立夫加以慰留。陳立夫批示文為：「仰切實查明此次風潮主使者予以懲戒，所請辭職，應毋庸議」，顯示陳立夫頗為嘉許竺氏在第一時間報告與負責的態度，但其首要希望是竺氏協助調查並給予主使者懲戒以平息風波。此當可證明上述國民政府逼竺氏辭校長職，而竺氏為顧全大局而拒絕之誤。

2)〈軍政部致教育部代電〉：⁶²

此電紀錄了竺可楨在浙大反孔遊行爆發當天的作為。在浙大遵義本部學生發生遊行（民 31 年 1 月 16 日）前的清晨，竺可楨已被「請」至遵義警備司令部面談，囑其「設法約束學生，勿使越軌」，但是商談至一半，司令部獲報浙大部份學生已出校遊行，竺可楨匆忙前往阻止，但無效。另教育部鍾督學報告中也指出：

該校（浙大）遵義學生遂於一月十六日晨七時自行停課開會，竺校長聞訊當即委同教務長、訓導長及各院院長等到場剴切曉諭，指斥聯大學生傳單所舉與事實不符及荒謬各點，該升等未能及時領悟，乃有學生四百餘人排隊遊行，學校當局無法制止。⁶³

⁶⁰ 劉惠璇，《抗戰時期大後方大學訓育問題之研究》，頁183。

⁶¹ 〈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致陳教育部長電〉，《教育部禁止各地學生遊行反孔案卷》第壹冊（民國31年1月16日），黨史館，館藏號：特3/29.3。

⁶² 〈軍政部致教育部代電〉，《教育部禁止各地學生遊行反孔案卷》，第壹冊（民31年2月7日），黨史館，館藏號：特3/29.17。

⁶³ 〈教育部長陳立夫上委員長簽呈〉附鍾道贊報告，《教育部禁止學生遊行案卷》，第參冊（民31年2月1日），黨史館，館藏號：特3/29.35。

竺氏努力協助政府穩定學潮已於上見，故鍾道贊等才會在返部報告中指出：「竺校長以督導資格參與開會，監視遊行，出言懇摯，啟具苦心了」。上述這些檔案均可說明，從浙大反孔遊行未爆發前至爆發後，竺可楨一直與政府當局密切配合，共同防範反孔情勢發生，並非如上引回憶錄中所言「堅決與學生站在一起而反對政府」，此可證實不少時人回憶錄中所記是竺可楨在學生心中的「形象」而非在反孔事件中的「作為」。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竺氏懲處領頭學生的態度上，事實是竺可楨迅速於事件發生兩天內（18日）即公布嚴懲領導浙大學生反孔遊行的首要份子六人，包括四人記大過，二人開除，實寓殺雞儆猴之意濃厚，是浙大反孔學潮迅予平復的重要因素一，絕非一味袒護學生，反對政府。

透過上面幾則資料的分析，實需重新定位竺可楨在浙大倒孔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筆者認為竺可楨當是本於愛護學生與維護學校正常運行之意，校長首要任務是立於政府與學生之間謀求迅速讓這場衝突緩和下來，故竺氏在該事件中始終扮演學生與政府間「緩衝者」而非「領導者」的角色。不應僅以「竺可楨隨隊遊行」而逕推竺可楨是「領導學生遊行」。此點旁證包括在西南聯大反孔事件爆發後，蔣中正給予警憲與教育部的命令均為「教職員參加或策動者應切實詳報」，⁶⁴若竺可楨真去領導遊行，正給政府嚴懲浙大或關閉浙大之藉口（政府因大學鬧學潮而關閉學校在戰時並非沒有發生過）⁶⁵，此絕非智者之所為。且因竺氏處理得宜，負責調查浙大反孔事件的督學鍾道贊才會在給陳立夫的報告中讚賞竺對學生遊行的處理，並建議教育部力保竺可楨繼續擔任校長。至於是否有浙大教職員參與此次反孔遊行，在教育部的調查中遵義校區是沒有的。至於唯一出現在名單中有「散發反動傳單嫌疑者」潘家蘇則是浙大湄

⁶⁴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致教育部陳部長代電〉，《教育部禁止學生遊行案卷》，第參冊（民31年1月15日發），黨史館，館藏號：特3/29.44。

⁶⁵ 如1941年秋，重慶大學因校長更調爆發學潮，教育部曾令解散，旋再設整理委員會整頓復校。見：沈雲龍主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第五編第二章（臺北：文海出版社，1986），頁623。

潭校區的助教，但仍有爭議不小，此部份擬於下再論。

2. 湄潭校區：

浙大湄潭校區響應反孔運動的原因與概況，據教育部督學鍾道贊等的調查與遵義部份情形大致相同，同樣有學生（劉玉釗）接獲來自西南聯大的信函要求其響應反孔運動，復經校中活動份子張秋芳（女）、錢念杞、金德椿（此人要求開會最烈）、李學應、任學勤、顧源（女）、汪麗泉（女）、竇祖麟、梁鶚諸人組織，擬定於 16 日開會遊行（是日停課），並於是日出廣告一張，題為「新五四運動」以反孔為主旨，而最後口號則為擁護中國國民黨蔣總裁等語。然而該會尚未舉行，湄潭地方軍警單位即於 17、18 兩日清晨在校外發現反動傳單二種（18 日晨據縣府報告還曾發現槍聲二三響），傳單均名為《除孔宣言》，內容中有：

我們要求學生自治會，召開代表大會及全體會員大會，做有計畫，有組織的行動，如今第一要打倒禍國殃民的孔祥熙，第二要打倒孔祥熙的背景——蔣介石，第三要打倒破壞統一的國民黨，第四要打倒腐敗不堪的國民政府，起來吧同學們、各位先生們，千載一時的機會到了。⁶⁶

這些宣傳品直接號召「倒孔反蔣」，將「倒孔」與「反蔣」兩事連結，可謂風格已大異於昆明與遵義兩地區。湄潭浙大學生見此傳單也有兩派意見，一派主張停止開會遊行，一派立主開會以根究此項傳單之來源，二派相持之下開會不成，學校遂維持常態。至 19 日湄潭又發現第三種傳單，內容除再次說明前二紙，對國民政府的批評更顯犀利，學生因凜於反動詞語之驚人，遂相率打消反孔計畫，上課如初。⁶⁷

⁶⁶ 該文件內容見：〈在遵義發現之昆明聯大傳單〉，《教育部禁止學生遊行案卷》，第參冊（原宣傳品註明時間：1942.1.17於湄潭），館藏號：特3/29.38。

⁶⁷ 〈教育部長陳立夫上委員長簽呈〉附鍾道贊報告，《教育部禁止學生遊行案卷》，第參冊（民31年2月1日），黨史館，館藏號：特3/29.35。

然而湄潭反孔情事並未因此結束反而出現案外案。十九日縣府派向姓秘書長與保警隊長一人、警兵一人，助理秘書一人會同縣黨部書記長葉道明及幹事王秉於深夜以查戶口的名義，在浙大湄潭校區外某處，發現有兩浙大學生（一係助教潘家蘇一係學生藤為藩）涉嫌印發反動傳單與有反政府行為。據縣府舉證該二生可疑之證物有四件：一為四封行發而未發之信，其中包括反孔傳單，置於抽箱面上；二為印刷反孔傳單之油印蠟紙，曾燒一角而未盡燬者，扔在床側；三為中大柏溪分校署名長河者來信一件，內稱：「若非體弱已赴 XX 路軍工作」等語；四為未用之蠟紙二張。當經發現，二生極口呼冤，稱這些物品不知從何而來。檢查者遂將嫌疑物帶存縣府，人未逮捕（潘、藤二人次日主動移校居住）。至二十四日由浙大校長竺可楨親將二人帶赴遵義交專署看守。⁶⁸

關於此湄潭縣府舉報的反孔案件，教育部派至現場調查的鍾道贊等提出不少疑點，在回部報告中他們是這樣記錄的：

結果：湄方既無開會遊行之舉，自無事實結果可言，故問題遂偏重於反動傳單之追求。此事就表面論其嫌疑固大矣，而其中淵源有不能不鄭重。將要者請於次二款陳之。

要點：（一）浙大與地方政府黨部不見融洽。（二）潘藤二生係校內高才，向好活動，故非可信之人，而葉道明亦不是安分輩，其與浙大嫌怨正深以潘生為尤甚，去年葉在永興任小學教員並黨部書記時曾一度公開攻擊浙大，當場被浙大學生侮辱，潘生為首。（三）兩生現呼冤待白中。⁶⁹

督學鍾氏等的觀點，顯然為陳立夫接受，而陳氏亦更加留心地方軍警與縣府欲假反孔案件向中央爭功或是趁機挾怨報復的可能。故陳

⁶⁸ 〈教育部長陳立夫上委員長簽呈〉附鍾道贊報告，《教育部禁止學生遊行案卷》，第參冊（民31年2月1日），黨史館，館藏號：特3/29.35。

⁶⁹ 〈教育部長陳立夫上委員長簽呈〉附鍾道贊報告，《教育部禁止學生遊行案卷》，第參冊（民31年2月1日），黨史館，館藏號：特3/29.35。

立夫在 2 月 5 日發電給貴州省主席吳鼎昌（1884-1950）等電報中轉達竺可楨「慎重處理，並予潘、滕申雪時機」⁷⁰之請求；2 月 20 日陳立夫給蔣針對湄潭反孔案件作正式報告時特別提醒蔣：「湄邑素好訟，多匿名紙帖，挾嫌爭利」，並附上《湄潭縣志》證明之。⁷¹

總上而論，浙大湄潭校區反孔運動雖未成行，但隨公開反政府文宣的出現，標誌反孔運動已出現重大轉變：反孔運動陣營分裂日深與訴求的激烈化。值得觀察的是，負責主管教育事務的陳立夫在警覺反孔運動出現質變後，處理手腕展現的是更加警慎與小心。陳氏不但在第一時間慰留竺可楨繼續領導浙大，以穩定浙大師生情緒；再則與竺可楨達成共同默契：一方面迅速且嚴厲懲處帶頭學生以起殺雞儆猴之效，另一方面輕縱情節較輕的學生以免濫加施罰會刺激學生進一步行動；第三向蔣請示約束地方軍警不要過渡涉入校園事務，仍盡量以浙大校方自身處理為佳；第四對於可能存在的栽贓情事極力避免，雖在湄潭有搜出明目張膽反蔣反政府的情事，陳立夫將之劃分清楚，對即時喊停的湄潭反孔學生沒有加以追究。這些特點均能反應陳立夫處理學運的老練，事實證明也起了非常好的效果，未使浙大反孔風潮延續擴大下去。

3. 反孔風潮的變調：中山大學人事紛爭案

約在 2 月中旬後，隨政府加強控管與軟硬兼施手法逐漸奏效，以學校學生為主的反孔運動漸入尾聲，然至同年 4 月底教育部突又收到中山大學師生檢舉發生反孔之人事。這封屬名為「中山大學忠實黨員員生一二八名」，直接寄給教育部長陳立夫的舉發信內容如下：

立夫部長鈞鑑：肅稟者自全面抗戰以還鈞長輔佐委座，使全國教育之設施，抗戰文化之鞏固，均賴鈞長規陳善導，愛恤

⁷⁰ 〈竺可楨致教育部電〉，《教育部禁止各地學生遊行反孔案卷》，第壹冊（民31年1月30日），黨史館，館藏號：特3/29.14。

⁷¹ 〈教育部長陳立夫上委員長簽呈〉，《教育部禁止學生遊行案卷》，第參冊（民31年2月20日），黨史館，館藏號：特3/29.35。

青年，功在黨國，人所共知，然不肖之徒，欲害國殃民，別展懷抱，故自香港事變之次，異黨乘機煽動，鼓其造謠之能事，謂孔祥熙部長夫人以飛機載運私物洋狗，拒絕中委乘機，並謂有某某因此自殺等語，使黨政軍各界人士幾為其所惑，幸中央當局嚴令制裁，事遂平息，惟本校代理校長張雲，蔑視當局委託之重，濫用異黨份子，其目的在謀固其地位，以致不擇手段，卑鄙貪污，無所不為，全校行政，倒行逆施，紊亂異常，使莊嚴最高學府，變為黑暗地獄，至學生不務於學，而每為異黨所誘，敢於言行，公然違反黨國政策，攻擊黨國當局，無所不用其極。如附中主任張文昌，便為異黨份子之一，常以意見爭論，詆毀黨員，致引起附校教職員總辭職，然張雲竟以私情包庇，委屈處置，以致怨聲載道，敢怒而不敢言。查張文昌於接奉中央通令指明是非，猶敢在其所主持公民測驗試題內第二十五條大書特書「以中央派港營救要人的飛機載運洋狗是……」以挑撥學生之反感，而謀達其破壞黨國之野心，員生等以黨校大權，日趨旁落，非常痛心，因組忠實黨員探查奸黨行動，擇其尤者隨時密呈中樞，希望積極有所改革，以求符合紀念我國父大學之實也。現謹附上該科試題二紙，以為證據。敬懇鈞長垂察並緝究奸黨，黨校幸甚，國家幸甚，謹請鈞安。⁷²

觀上信實具有濃厚人事鬥爭之氣氛。該文旨在檢舉附中主任張文昌藉「飛機運狗」試題「挑撥學生之反感，而謀達其破壞黨國之野心」，而中山大學代理校長張雲則「濫用異黨份子，其目的在謀固其地位，以致不擇手段，卑鄙貪污，無所不為，全校行政，倒行逆施，紊亂異常」，要求教育部加以調查與懲處相關人事。陳立夫對於此信想法為何沒有紀錄，但可從教育部在 5 月 21 日發給中山大

⁷² 〈中山大學忠實黨員一二八人至教育部長陳電〉，《教育部禁止學生遊行案卷》，第參冊（民31年4月21日），黨史館，館藏號：特3/29.61。

學代校長張雲的訓令內容探知一二，該訓令原文如下：

訓令

令國立中山大學張代校長

據報該校師範學院附屬中學舉行公民科時事測驗，命題有：「以中央派港營救要人的飛機載運洋狗是……」該科擔任教員顯係存心挑撥學生反感，殊屬不合！仰即查明該教員姓名，呈候處分。該附中主任張文昌失察，並應予以申誡，仰轉飭知照。⁷³

此令。

教育部

與之前西南聯大、浙大等大學掀起之反孔風潮相較，此次教育部僅要求張雲調查事件原委與懲處張文昌不當行為，既未緊急通知該地附近各大中學校，也沒有派遣督學專員等詳加調查，顯見教部似僅視該事件為人事傾軋，訓令用語雖嚴厲，但實則較寬緩對之。究其原因當是中央不想讓眼見已告平息之反孔運動再節外生枝，甚至死灰復燃。另一方面，中山大學此次之反孔因涉及人事糾紛，焦點也趨於模糊，當然亦無法如前期具有在各校間串連的號召力，故不久即告平息，沒有繼續擴大的跡象。

五、結語

由本文的討論可以證實，戰時中國大學所領導的「反孔運動」實非僅為一場「單源」性質的學生運動。從第一階段《大公報》報導該事件開始，代表著以「媒體人」的角度來監督與報導政府「弊

⁷³ 〈中山大學忠實黨員一二八人至教育部長陳電〉，《教育部禁止學生遊行案卷》，第參冊（民31年4月21日），黨史館，館藏號：特3/29.61。

端」(當然在戰時媒體力量相對薄弱,但在政府高壓下仍勇於刊出〈擁護修明政治案〉之社論可以看出王芸生的堅持與《大公報》享譽國際的原因)。發展至第二階段昆明學生運動中,主要以地方青年團成員領導,在雲南省主席龍雲默許下以「護國救黨」旗幟對孔祥熙等權貴之家進行批判,除具有「黨內風暴」的特徵,也能反映雲南在戰時與國府中央重慶微妙的既抗衡亦合作的關係。在第三階段浙大反孔後反孔情勢日漸複雜,雖主要仍以青年團幹部、成員為主,但加上有明顯共黨活動的痕跡,對政府的攻訐從「批孔」逐漸上升到「批蔣」,但在國府不斷澄清「飛機運狗」的真相,反覆宣揚「團結抗日」,「秩序第一」的重要下並未形成大規模騷亂,展現國府尚有一定對大專學生的控制力,而竺可楨校長與教育部長陳立夫的妥善處置亦為關鍵。最後反孔終因焦點日失、結合人事鬥爭的中山大學等事件而日益沒落,為其他訴求的學生運動所取代。

此外值得注意的要點還包括:第一、反孔雖源於《大公報》一則內容不確的社論,但屢經政府部門消毒澄清、地方黨團首長再三圍堵警告,連自身青年團幹部都不相信,顯見國民政府威信不彰、孔祥熙及其家屬社會評價低落、民眾對於國府財經外匯政策的質疑確實存在。然國民政府在浙江大學爆發反孔情事後力圖亡羊補牢,教育部部長陳立夫與各校長密切聯繫安撫制止學生反孔情緒,再加蔣中正高度關注該事件發展,力陳國家民族生存當前不能有絲毫之亂,確起即時穩定局勢之效;第二,隨反孔訴求、領導份子日益混雜分歧,實則是削弱反孔運動的力度與廣度而非增益之;第三,中共、國家社會黨黨人在此事件中所佔地位始終非主要領導核心,雖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一度發現有名為「民生社」的團體在印發反政府言論,⁷⁴然與湄潭發現的反政府傳單一様,號召力有限。而從聯大到中山大學的反孔活動,「校內」反孔最激烈言論僅訴求「誅殺孔氏,抄沒孔家」(浙大遵義校區),僅「校外」有「倒孔反

⁷⁴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1942年民生社倒孔史料一組〉,《民國檔案》,(南京:民國檔案編輯部,2002年1月),頁29-31。

蔣」的呼籲（浙大湄潭），故筆者推論，在抗戰中期（1940 年代左右）多數民眾與學生仍是服從於國民政府領導抗日的旗幟之下，訴求多是「撤換貪官污吏」而非全面「反政府」，切不可與戰後爆發的學潮混為一談。

附錄

電報／ 信函名	時間 (民國 31 年)	內容	館藏號
〈陳布雷致陳立夫函〉	1 月 7 日收	陳布雷轉抄龍雲致蔣委員長電報給陳立夫，報告該日聯大中法同濟三校學生擾亂及處置情形。	特 3/29.52
〈朱家驊致陳立夫抄電〉	1 月 7 日收	朱家驊將雲南省黨部書記長趙澍來電告知西南聯大發生倒孔案通知陳立夫。	特 3/29.53
〈陳立夫覆朱家驊函〉	1 月 8 日發	陳立夫答覆朱家驊來電已知悉，並告知：已急電聯大雲大中法同濟四校負責人迅即制止，此事顯係有人策動，請即分電省黨部及校黨部共同防範制止，勿使擴大。	特 3/29.53
〈陳立夫覆陳布雷函〉	1 月 8 日發	陳立夫答覆陳布雷來函已知悉，並告知：已急電聯大雲大中法同濟四校負責人迅即制止，並予組織部、青年團取保聯繫，分電各校黨團部矣。	特 3/29.53
〈陳立夫致西南聯大張伯苓等電稿〉	1 月 8 日發	陳立夫致電西南聯大張伯苓等，告知聯大雲大中法同濟各校學生有聯合遊行。	特 3/29.54
〈教育部致樂山武漢大學王校長等電〉	1 月 8 日發	教育部電告武漢大學、浙江大學校長，昆明聯大學生發動反孔副院長運動，並聯合雲大等校學生遊行開會等情事，除已電令聯大雲大等校迅即制止外，希密加防範為要。	特 3/29.55
〈教育部致四川大學等電〉	1 月 9 日發	教育部致電四川大學等 13 校校長，內容同上則。	特 3/29.55
〈教育部致復旦大學等代電〉	1 月 9 日發	教育部致電復旦大學、中央大學、重慶大學三校校長，內容同上則。	特 3/29.55
〈朱家驊致陳立夫函〉	1 月 10 日收	朱家驊告知陳立夫再接獲聯大黨部與趙澍來電，並已囑趙澍「滇緬軍事緊急，應即立為設法平息」。附趙澍電稿。	特 3/29.34
〈蔣夢麟等致陳教育部長〉	1 月 10 日收	蔣夢麟、梅貽琦報告陳立夫本日（6 日）昆明市大學一部份學生因大公報社論至結	特 3/29.45

電報／ 信函名	時間 (民國 31 年)	內容	館藏號
電〉		隊遊行，經地方軍警勸阻已回校，照常上課。	
〈教育部長陳立夫上委員長簽呈〉	1 月 11 日發	陳立夫向蔣中正報告反孔事件處理進度。包括已電令聯大等各校負責人，迅即制止；同時分電陪都附近，及川滇黔湘各省其他各國立院校負責人，密加防範在案；接獲聯大常委蔣夢麟、梅貽琦等魚電稱：兩人於 9 日曾召集昆明市各大學全體學生訓話，懇切告誡切勿輕信謠言，擅作無謂舉動，如再故違，定予嚴懲不貸！經訓話後，學生安心上課，學校秩序如常。蔣常委復稱：定十五日飛渝，面陳一切。	特 3/29.44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致教育部陳部長代電〉	1 月 11 日發	要求教育部致電聯大蔣夢麟等追究此事之內容及其煽動為首之人員，尤其是教職員參加或策動者應切實詳報。附雲南省政府龍雲魚電。	特 3/29.44
〈昆明西南聯大致教育部電〉	1 月 13 日收	西南聯大覆電教育部：已於六日告誡學生軍事時期需謹守紀律，本日全校集會再嚴切訓誡，不得再生枝節，目下全校安謐如常。	特 3/29.1
〈昆明熊慶來致教育部電〉	1 月 13 日收	昆明熊慶來覆電教育部：本校僅有數人中途潛往參加，奉示各點已剴切曉諭制止。	特 3/29.1
〈樂山武漢大學致教育部電〉	1 月 15 日收	樂山武漢大學覆電教育部本校無響應人事發生。	特 3/29.1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致教育部陳部長代電〉	1 月 15 日收	軍事委員會致電教育部陳部長西南聯大學生自治會於一月七日晚召集昆明各校學生代表會議，議決組織昆明學生討孔運動大會，由聯大負總責印發代電及宣言各五千份分發海內外，經費由各大學學生捐助等情，囑其注意。	特 3/29.46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致教育部陳部長代電〉	1 月 17 日發	軍事委員會致電教育部陳部長，告知昆明各大學學生因雲南日報於七日社論曾評及該示威運動及致發標語與傳單欠妥，該生等認為該報與孔副院長有關，遂又集會決議向該報提出嚴重抗議，並責令改正，否則搗毀該報社等情，即希注意。	特 3/29.46

電報／ 信函名	時間 (民國 31 年)	內容	館藏號
〈西南聯大致 教育部復電〉	1 月 20 日 發；2 月 12 日收	西南聯大答覆教育部本校學生壁報中確有一種名「天下」，係由學生七人編輯，自稱平社，該壁報平日言論尚屬穩妥，微日晨當學生因大公報社評消息紛加評論時，該社社員之一亦曾用平社名義隨同響應，嗣後並無其他行動。	特 3/29.55
〈軍事委員會 軍訓部致教育 部公函〉	1 月 21 日收	軍訓部通知教育部昆明反孔情勢情報。附西南聯大主任教官毛鴻報告。	特 3/29.4
〈昆明中法大 學復灰侍密 電〉	1 月 21 日收	中法大學急電教育部希代轉電蔣委員長：寅午學生結隊遊行，本校少數學生不明真相潛自出校參加，當即勒令回校嚴加告誡。教職員並無一人參加。	特 3/29.9
〈教育部長陳 立夫上委員長 簽呈〉	1 月 23 日發	陳立夫回報蔣中正最新處理狀況。包括：已再電飭聯大仍將為首份子查報，並派教育部顧次長前往昆明開導防制及協同查究。另報告浙江大學學生受西南聯大影響，亦於本月十六日結隊遊行，已嚴令該校校長防制查究，力謀恢復秩序，不許集會。	特 3/29.46
〈教育部致各 國立中學等 電、代電稿〉	1 月（原檔 無日期）	教育部電告各國立中學等共 24 校有關重慶大公報社論飛機運狗事為誤報，滯港要員遭殺害亦屬誤會，西南聯大學生因此發生反孔運動，恐有奸黨趁機搗動，現以嚴予處理，囑各校校長嚴加防範，如員生中有誤會言論，並應將事實詳為說明為要。	特 3/29.50
〈蔣委員長致 陳教育部長代 電〉	2 月 16 日	蔣委員長致陳立夫此次昆明西南聯大學生反孔運動主動份子名單有：胡一美、鍾正、陶師禹、程青、方之茂、程陶、羅振球、蔡福林等，或為本黨黨員，或為三青團團員。又該校文學院女生沈師光，理學院女生竺淑楨亦是主動份子，希為注意。	特 3/29.20

資料來源：《特種檔案》，《教育部禁止學生遊行案卷》，第壹、貳、參冊，黨史館

The Study of Anti - Kong Xiangxi movement

Wang, Po-Hsuan

Abstract

In the wartime student strike memoirs and the research, “the counter- Kong movement” is one of the wartime China most significant student movements. This event caused from the report “To support and reform politics motion” about Kong Xiangxi used flights to deliver foreign breed dogs in private. The message spread from school to school, and caused the student counter-movements Universities in Kunming, and the Zhejiang University one after another. But there were quite incorrectly relays in the report and the spread of message. In this paper, I use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ile in the KMT Party History Institute and the past research. I inspect and divide the counter- Kong movement into three parts: first- the event of the “Da Gong Bao” mistake-report, second - the student counter movements in Kunming Universities, third - the Zhejiang University continued. Besides clearing the questionable point, I hope to understand the background, demand, the way of organizing people of the leaders, and the deal-with way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Keywords: Anti - Kong Xiangxi movement, student unrest movement in the W.W.II